

# 清代苏轼诗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嬗变

郑祥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学院, 南昌 330000)

**摘要:**借助两级传播理论,探究清代苏轼诗从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的演变过程,聚焦于意见领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史料的梳理与分析,可发现王士禛、宋荦、查慎行、翁方纲等意见领袖之间的人际传播,对随后发生的大众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苏轼诗大众传播的深度、广度与传播方向,都与王士禛、查慎行等意见领袖的个人观点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关键词:**清代;苏轼诗;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意见领袖

**中图分类号:**I207.65;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8)04-0102-06

关于苏轼诗歌在清代的传播,学界主要聚焦于苏诗注本在清代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据清人钱大昕《苏文忠公诗合注序》,清代流行的苏诗注本主要有三种:“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其行于世者,唯永嘉王氏、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sup>[1]</sup>钱大昕所说的三种苏诗注本,即南宋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和南宋施元之、顾禧注,施宿补注,清人宋荦、邵长蘅重新编订刊刻的《施注苏诗》以及清人查慎行的《苏诗补注》。客观来说,这三种注本在清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后来产生的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也是在对这三种注本加以删削合并的基础上产生的。

笔者认为,探究清代苏轼诗的传播,并不能仅仅聚焦于这三种或更多几种苏诗注本、苏诗选本的刊刻流传,这只能说是第一步的材料整理工作。其实更有意义的是,借助传播学理论,来探讨清代苏轼诗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理论问题。因为文本是静态的,传播活动是活的、动态的,文本需要通过传播活动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而传播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清代苏轼诗的传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其大众传播行为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与人际传播,尤其是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关系密切。对相关史料稍做梳理即可发现,清代苏轼诗的这种人际传播,特别是与意见领袖相关的人际传播,对随后发生的大众传播,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要厘清这些问题,就

要先梳理与清代意见领袖相关的苏轼诗的人际传播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研究清楚,如何由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发生嬗变。最后就会看到,在苏轼诗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所起的作用。

## 一、清代苏轼诗的人际传播及意见领袖的作用

“人际传播”在传播学中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应该说,在清代苏轼诗传播过程中,普通人、普通读书人之间的人际传播,其意义有限,最多是构成了一种文学接受。更应该注意的是,意见领袖之间的人际传播。“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是 1944 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所提出,后为众多学者认可与接受<sup>[2]</sup>。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大体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人士。国内学术界对“意见领袖”的定义多从这方面着眼,如李彬教授认为:“意见领袖”“就是积极主动地向人们提供某方面的客观事实并加以主观评断的人。”<sup>[3]</sup>在清代苏轼诗的传播中,这种传播学意义上积极主动向他人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意见领袖”显然也是存在的。以影响与作用而论,清代诗人、诗歌理论家王士禛、宋荦、查慎行、翁方纲等人,都可以被视作苏轼诗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那么在這些意见领袖之间的人际传播,就值得进一步的梳理与探究了。

**收稿日期:**2018-05-26

**作者简介:**郑祥琥(1983—),男,江西高安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清代诗学。

第一,王士禛发起的人际传播及其影响。

王士禛是清初尤其是康熙诗坛的重要领袖,对整个清诗发展深有影响。他所关涉的苏轼诗人际传播有多起。这里举比较重要的几起。一个是顺治十八年(1661)春,王士禛在扬州上方寺发现了苏轼诗断碑,上刻苏轼诗《次韵苏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表》,该诗被刻石在蜀冈,年久之后,被遗弃在草间。王士禛官扬州时,发现了这一石刻。随后王士禛作有《上方寺访东坡先生石刻诗次韵》,并在后来《居易录》等各种笔记中谈到这件事<sup>[4]</sup>。这件事,在王士禛的诗友圈中被迅速传播,其主要途径自然是人际传播,王士禛的朋友们口耳相传或书信相传。汪琬有一组《扬州怀古杂诗六首》,在第六首诗末有汪琬自注:“贻上新得东坡碑刻于蜀冈粪土中,复树之,故云。”<sup>[5]</sup>此诗应是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汪琬南归在扬州盘桓三日期间,与王士禛唱和所作。这次汪琬暂留扬州,王士禛邀请冒襄、陈维崧等名士聚饮送别,其间很自然会谈到半年前王士禛所发现的苏轼碑文,汪琬这才在诗文中加以记录。此事在江南文人圈中影响较大,属于典型的人际传播,对江南文人中崇苏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另一件事是王士禛在康熙十四年(1675)夏回京师后,多次与人次韵唱和苏轼清虚堂诗。目前留存的次韵诗共三首,分别是《用东坡先生清虚堂韵,送黄无庵僉事归甘肃兼寄许天玉》《同李湘北、陈子端二学士,叶子吉侍读,登慈仁寺阁,再用清虚堂韵》《通州水月庵三用清虚堂韵》。所谓的“清虚堂韵”为苏轼的一首诗(标题非常长),即《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一诗。在这次接连的唱和当中,王士禛连续在京师的不同地点,与不同士人次韵苏轼清虚堂诗韵,先后涉及黄无庵、许天玉、李湘北、陈子端、叶子吉等六七人。这种频繁的次韵苏诗,自然在京师地区大力传播了宗苏轼诗的观念。据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自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王士禛在京师文士中早就有了很大影响,“是时,士人挟诗文游京师者,首谒龚端毅公,次即谒山人及汪、刘二公。”<sup>[4] 5078</sup>那么当康熙十四年,王士禛丁忧之后,再回到京师,且频繁与人次韵苏轼诗,显然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能够影响很多士人

对苏轼诗的态度。

王士禛依靠人际传播来传扬宗苏轼诗的观念,实例很多,以上只是比较集中比较典型的两起。总体看,王士禛关于苏轼诗的人际传播,在清代的士大夫、诗人圈子中影响很大,对后来很多涉及苏轼诗的文化事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了后来宋荦、查慎行等人对苏轼诗进行大众传播的行为。王士禛可以算作在苏轼诗传播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见领袖。

第二,清代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中的人际传播。

清代苏轼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苏轼生日纪念活动,往往是在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这天。一些崇尚苏轼诗的文人,要举行苏轼纪念活动,其间往往要拜祭苏轼画像,可以称为“苏轼生日会”“拜苏活动”或“寿苏雅集”<sup>[6]</sup>。目前可考的影响较大的拜苏活动的组织者,包括宋荦、翁方纲、毕沅、吴荷屋等。

这种苏轼生日前后举行的“拜苏活动”,参与者少则近十人,多则几十人近百人。与会者要瞻仰苏轼画像、瞻仰宋版苏轼诗集、欣赏苏轼作品,同时一般也要作诗或次韵和韵苏诗。现在可考的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宋荦在江宁巡抚任上刊刻《施注苏诗》。刊成之日,恰逢12月19日苏轼生日,于是这一天宋荦召集文士、幕客以及府学生近百人,举行了一次苏轼纪念活动。宋荦的这次苏轼生日纪念活动,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后真正将这种纪念活动频繁举行,推向常态化的则是翁方纲。可考的翁方纲第一次纪念活动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他购得宋荦所藏《施注苏诗》残本,两天后的苏轼诞辰日,翁方纲便模仿宋荦,举行东坡诞辰纪念活动,此后几乎年年都要举行类似活动。以乾隆四十五年(1780)翁方纲召集的“东坡生日会”为例。这一年苏轼生日,翁方纲设东坡像,奉荐笋脯,又摆黄庭坚、王守仁、沈周及毛奇龄、朱彝尊二先生像以配东坡先生之筵<sup>[7]</sup>。请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桂馥、宋葆懌等人到斋,共同纪念苏轼,重观宋荦《施注苏诗》残本以及宋葆懌所作《李委吹笛图》。与会人士,皆为一时名士,且多有作诗。翁方纲题诗四首。参会的蒋士铨也有作品,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收有《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翁学士招集苏斋,瞻拜遗像,分得“南”字》<sup>[8]</sup>,即是这次集会活动所作的诗。

再比如,毕沅组织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毕沅第一次举行“东坡生日会”,发生在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比翁方纲晚了近十年。后来毕沅刊有《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收录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五十一年(1786)共四次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中所作的诗文。而据朱则杰先生考证,毕沅主持的东坡生日纪念活动并不仅仅这四次,“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开始,到嘉庆二年丁巳(1797)七月毕沅逝世的前一年嘉庆元年丙辰(1796)为止,这个设祀活动总共应该有十五次。”<sup>[9]</sup>而参与的人数,据朱则杰先生考证至少在三十八人以上。从参与者的名单可发现,参与者不乏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等清代重要的诗人、学者。

这一类型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依靠面对面的的人际传播,虽然参与者不多,但一般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文士,很多都属于传播学概念上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举行这种“苏轼生日纪念活动”,在参与者中制造一种“崇苏”的氛围。不知不觉间,参与者就加深了对苏轼的推崇,加深了对苏轼诗的感悟。而由于他们都属于意见领袖,所以离开之后,又以自己为节点,来传播“崇苏”观念。

比如,翁方纲的弟子凌廷堪参与过翁方纲举行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也参与过毕沅举行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六收有他参与毕沅组织的祭苏活动所作的诗,即《秋帆中丞每岁十二月十九日,置酒高会为束坡作生日,丁未冬以病不果,于戊申正月补为之。同人各赋七言长句一章,时在坐者吴竹屿舍人、张吾山广文、唐柘田进士、方子云布衣、洪稚存博士、徐朗斋孝廉、朱秋岩明经、沈春林上舍、王石、华嵩夫二茂才也》<sup>[10]</sup>。“秋帆中丞”即是毕沅。据凌廷堪的诗题,这次活动发生在乾隆“戊申”即 1788 年。参加苏轼生日集会纪念活动,对于凌廷堪传承翁方纲的宗宋崇苏诗学,是起过一些作用的。后来凌廷堪将这种理念,传递给了他弟子程恩泽,以程恩泽为中心,形成了晚清道光以后声势浩大的“道咸宋诗派”。“道咸宋诗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推崇苏轼,无论是程恩泽的弟子何绍基、郑珍,还是身居高位的曾国藩,都非常推崇苏轼。在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中即收有大量的苏轼诗。这种崇苏诗学观,都可以上溯到乾嘉时期频繁举行的苏轼生日纪念活动,其人际传播的效果是深刻与持久的。

## 二、清代苏轼诗传播中,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嬗变

传播学上对于“大众传播”是有较为明确的定义的。如郭庆光先生《传播学教程》认为:“古登堡的印刷术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即我们在定义中所界定的大众传播)的诞生,却是近 400 年以后的事情,确切地说,近代大众传播的起点,应该以 19 世纪 30 年代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sup>[11]</sup>这一看法是将 19 世纪作为“近代大众传播的起点”,而此前较长的历史时期则不计算在内。应该说,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大众传播的起源时限推前。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诞生于 15 世纪 40—50 年代,其标志是德国工匠古登堡使用印刷机和金属活字技术,印刷出了第一批油印《圣经》<sup>[12]</sup>。与此类似,中国学者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传播史》详细探讨了从秦汉以至唐宋元明清的中国官方报纸即邸报与民间小报的情况,如认为“明代的‘邸报’的外观如书册,每期出一小册,页数不定,时有增减。字数通常在三五千之间。每期的总发行数约为 5000 到 10000 册。”<sup>[13]</sup>这实际上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大众传播了。所以一些学者也把中国古代的一些传播活动视为大众传播。如黄星民认为:“唐雕版与宋活版印刷出现之后,文字开始广泛流行,中国的大众传播活动既有手抄与手工印制的古代书报,又有衰落的礼乐和新兴的戏曲。”“因此我们把古腾堡印刷机视为现代大众传播时代开始的标志。在现代大众传播时代之前的古代大众传播时代的书报我们称之为古代书报。”<sup>[14]</sup>

综合几种观点来看,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的书报传播,视为大众传播,只是应被视为“前现代”阶段的大众传播,与现代机器工业时代的大众传播,自然会有一些不同。但在一些重要特点上也有显著的相通性。以此为基础,可以来研讨清代苏轼诗的大众传播问题。据前文所述,清代流行的三种苏轼诗注本中,其中后两种,即宋萃、邵长蘅编订的《施注苏诗》、查慎行的《苏诗补注》,都产生于清代的“崇苏”氛围中,有一个在意见领袖之间互相影响,从人际传播迈向大众传播的过程。可分而论之:

第一,宋萃受王士禛等多方面人际传播的影响,着力发掘苏诗,而重新编订刊刻宋本的《施注苏诗》。

宋萃在清代苏轼诗集传播史上起到了很关键的

作用。因为成于南宋的《施注苏诗》至清代已罕见传本了,是宋荦的重新编辑刊刻才让该书得以真正广泛流行。宋荦在《漫堂说诗》中曾自述自己的学宋历程:“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sup>[15]</sup>康熙壬子是康熙十一年(1672),据刘万华《宋荦年谱》,宋荦在这一年“五月,入都候补。”按照这段自述,京师宋诗风兴起后,宋荦也改变了诗风,开始学宋。宋荦所说的“海内名宿”,就包括王士禛。据前文可知,王士禛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丁忧结束后,重回京师时,便通过人际传播,大力传播“崇尚苏轼诗”的观念,在京师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宋荦与王士禛关系非常密切,有大量的诗歌唱和与书信来往,王士禛崇尚苏轼,很自然就对宋荦产生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书信交流等人际传播的方式产生。

而王士禛与宋荦之间关于“崇尚苏轼”观念的人际传播,对于宋荦后来编订刊刻《施注苏诗》有很大的影响。在编订刊刻《施注苏诗》过程中,王士禛对宋荦的鼓励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施注苏诗》刊成以后,宋荦诸人又运用王士禛的广泛影响,来推广传播这部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宋荦在江宁巡抚任上刊刻《施注苏诗》。年底12月19日,宋荦刊补《施注苏诗》完成,恰值苏轼生日,于是宋荦率领冯景、吴士玉、顾嗣立、儿子宋至等人在小沧浪净净轩,悬挂东坡笠屐像,进行祭祀活动。参与人士,除知名文士之外,江宁府学诸生也参加了祭祀,有上百人规模。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大的关于苏诗的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活动。祭祀之后,宋荦倡议参与的人士作七言诗纪念。宋荦作有《刊补施注苏诗竟于腊月十九坡公生日,率诸生致祭》,参与祭祀的冯景、吴士玉、顾嗣立、宋至等人,以及因事未曾参会的人士相继作诗,这些唱和诗歌集成了《东坡先生生日唱和诗》,由未能参加的邵长蘅作序。值得注意的是,在《刊补施注苏诗竟于腊月十九坡公生日,率诸生致祭》中,宋荦说:“短札急报渔洋老,应有好句酬狂奴。”<sup>[16]</sup>可见这次祭祀活动之后,宋荦还写信把活动过程与所写诗文,报送了正在京师任职的王士禛。现存王士禛就此事给宋荦的回信,王士禛说:“东坡先生生日集诸名士设祭,事佳诗亦可传,要当有一篇纪事。久不拈弄,恐不能如昔贤刻烛击钵耳。”<sup>[4]2440</sup>说明王渔洋是支持并赞扬此次祀苏活动的。而按照传播学上的定义,宋荦与王

渔洋的通信亦属于人际传播范畴。

可以说,此次宋荦在江宁的东坡生日祀苏活动,尤其是与王士禛的通信,是刊刻《施注苏诗》之后,进行广泛的大众传播之前,一次重要的人际传播,对随后《施注苏诗》的大众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尤其是王士禛对此事的褒扬,由于王士禛当时的文学领袖地位,相当于为此书的价值“背书”,更促进了该书的广泛传播。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王士禛的褒扬,宋荦重新编订出版的《施注苏诗》则就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后来的大众传播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第二,宋荦之子宋至在京师与查慎行会面后,赠给查慎行一套《施注苏诗》。这一人际传播事件对查慎行影响巨大,促使查慎行在两年后出版自己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自青年时代即开始注释苏轼,但一直没有出版,直到康熙庚辰年(1700)春,他在京师遇到宋荦之子宋至。在《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中,查慎行简述了《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

余于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于王氏注,为之驳正瑕璲,零丁件系,收弃篋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旧本苦不易购,庚辰春与商丘宋山言并客辇下,忽出新刻本见贻。检阅终卷,于鄙怀颇有未愜者,因复补辑旧闻,自忘芜陋,将出以问世<sup>[17]</sup>。

据此,查慎行在康熙癸丑年(1673)即开始着手对苏轼的注解,此时他只有23岁。此后二十年,不断有补充修订。康熙庚辰年(1700)春,他在京师遇到宋荦之子宋至,宋至赠送了查慎行一套新出的《施注苏诗》。此前不久,宋荦在江宁巡抚任上刊刻《施注苏诗》。宋至到北京时,应是随身携带了若干部其父宋荦新出的《施注苏诗》,赠给了查慎行一部。查慎行看到这部注释后,大受启发,随后一年多,他加紧对自己的苏轼注进行写作,在1702年也出版了自己的《苏诗补注》。

梳理查慎行《苏诗补注》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到人际传播的重要影响。尤其是1700年查慎行与宋荦之子宋至在京师的会面,两人面谈之后,查慎行获得了大量的有用信息,这对查慎行下定决心出版自己的《苏诗补注》起了很重要的催化作用。如果没有这次与宋至的会面,没有相关的信息交流,查慎行可能就

不会意识到注释苏轼诗的巨大价值,可能就不会这么快速地出版自己的《苏诗补注》。甚至由于俗事的羁绊,人事的代谢,查慎行这部书最终不能面世也是有可能的。可见,查慎行《苏诗补注》一书能够走向大众传播,离不开前期几次重要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中传递、汇总出的新信息,直接促进了大众传播的展开。

### 三、清代苏轼诗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启示

从以上对清代苏轼诗传播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相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传播学上的“两级传播”理论,在文学传播上也是适用的。

从人际传播向大众传播的嬗变,是很多传播事件的共性,文学作品的传播也符合这一点共性。类似苏轼诗这样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下子就直接传播给大众的。因为大众的欣赏水平、认知水平有限,很难一下子就认识到一些文学作品的价值。这就需要一些传播中介,或者意见领袖,来扩大如苏轼诗这样的作品向大众传播的广度与力度。这显然就是传播学上的“两级传播”的过程。按照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中的“两级传播”观点,即信息总是先从广播和报刊流向意见领袖,再从这些意见领袖传到普通大众<sup>[2]128</sup>。从清代苏轼诗的传播过程来看,以意见领袖为中介的两级传播是客观存在的。

更进一步来看,在涉及文学作品的大众传播之前,会有一个人际传播的过程。这正是对所传播的内容的一个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的过程。只有经过人际传播,获得认可,获得某种更大传播的“需求”或曰“通行证”,接下来的大众传播,才会名正言顺的到来。大众传播有时并不是单向的信息灌输,而是对人际传播中已被证明的有效信息的一种放大,是对更大范围即全社会“信息需求”的一种满足。

第二,人际传播在大众传播的事前、事中、事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人际传播是所有传播系统中最小、最基础的子系统。因其小,因其基础,所以它在大众传播

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在大众传播的事前,人际传播起到了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对什么样的信息应该进入大众传播进行筛选。有效的大众传播需求,被推荐。无效的大众传播需求,被遮蔽。这一步骤,经常不显著,但其实对大众传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的事中,人际传播可以对大众传播进行反馈,对需要的效果进行“强化”,对不需要的效果进行“纠偏”。在大众传播的事后,人际传播可以对大众传播的效果进行总结评估,以确定下一次大众传播的方式方法。

第三,在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意见领袖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上文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到,在清代苏轼诗传播中,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意见领袖之间,通过人际传播,交流信息,形成“意见的共振”,形成一种变相的“把关”,筛选出值得传播的因素,淘汰掉不值得传播的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意见领袖在幕后的运作,一些文学作品如苏轼诗,被印刷出来,大范围的传播,被传播给大众。这一传播过程,无疑就是符合“两级传播”理论的。而这其中,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往往会对后期的大众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决定后期大众传播的深度、广度、传播方向、传播重点等。总之,在文学传播领域,意见领袖对于大众传播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 四、结语

从本文对清代苏轼诗、崇苏文学观念的史料梳理来看,清代苏轼诗整个的传播过程,与“两级传播”理论相当符合。大众传播之前,涉及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对随后的大众传播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可以推论,其实在古今中外很多的文学传播现象中,都有这种“两级传播”机制的存在。文学传播上的意见领袖,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对大众进行大范围的大众传播。

### 参考文献:

- [1] 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35.
- [2] 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M].唐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4.

- [3] 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150.
- [4]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6:278.
- [5] 汪琬.汪琬全集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93.
- [6] 孙敏强,霍东晓.试论清代诗人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1-8.
- [7] 沈津.翁方纲年谱[M].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152.
- [8] 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704.
- [9] 朱则杰.毕沅“苏文忠公生日设祀”集会唱和考论[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84-89.
- [10] 凌廷堪.凌廷堪全集:第四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9:74.
- [1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4.
- [12]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
- [13]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5.
- [14] 黄星民.从礼乐传播看非语言大众传播形式的演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3):35-44.
- [15] 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32.
- [16] 宋荦.西陂类稿:卷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0.
- [17] 查慎行.苏诗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5.

## The Transmutation from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of Su Shi's Poetry in Qing Dynasty

ZHENG Xiangh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wo-level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Su Shi's poetry from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opinion leaders in it. Through the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Wang Shizhen, Song Yu, Cha Shenxing, Weng Fanggang and other opinion leader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bsequent mass communication. The depth, breadth and direc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Su Shi's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all have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al views of opinion leaders such as Wang Shizhen and Cha Shenxing.

**Keywords:** Qing dynasty; Su Shi's poetr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opinion leaders

[责任编辑 夏 强]